



文化霸权论的 变异学研究

刘亚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霸权论的 变异学研究

刘亚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霸权论的变异学研究/刘亚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161-7568-2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文化侵略—霸权主义—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252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63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资助成果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学科建设出版资助

绪 论

文化霸权论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背景密切相关。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行，西方文化再次全面东传。西方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较大规模的传入，分别是明清之际、“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后者延续至今。与前两次传入不同，后者越来越与全球化背景结合在一起，文化也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加上华夏中心意识的消解，中国急于赶超西方的心态，使得文化霸权不仅成为一种因全球化的加快而凸显出来的文化现象，同时成为一种观察、思考和分析全球文化关系的有力武器，再者，随着国内学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论的有力汲取，它还逐渐发展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思潮。总之，文化霸权既是现实世界的文化现象，又是理论话语的学术现象。因此，文化霸权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也颇有学术价值，本书就以此为研究对象，下面就此研究做几点说明。

一 写作的缘起

初次接触文化霸权论跟国内文艺学界译介后殖民理论有关，萨义德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主将，必须对其著作进行阅读并深入理解。换言之，本书研究的开始是围绕着萨义德的文化霸权论而进行的，在梳理整个文化霸权论的变异史时便将其作为完成阶段。随着对萨义德理论了解的逐渐深入，“文化霸权”这个关键词越来越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便有意去查看国内外的研究资料，试图廓清其内在含义。就国内研究资料而言，逐步查阅了刘伟胜《文化霸权概论》（2002）、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

究》(2004)、张跖《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2009)、赵稀方《后殖民理论》(2009)、和磊《葛兰西与文化研究》(2011)、周兴杰《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2011)、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2012)以及相关文献等。综合来看,文化霸权概念在国内学界有三种较为经典的理解:

(1) 刘锡诚先生(2002)将其与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连,理解为艺术上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要通过争鸣来解决,不能诉诸政治手段和行政手段。

(2) 将文化霸权理论与“文革”中“文化大批判”相连,其中刘康先生(1995)与李泽厚先生(1988)就认为文化霸权理论未能在西方实施成功,却以“东方式的形态”被广泛实践过,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得到了具体的、较为成功的实践运用。

(3) 文化霸权被看作西方文化霸权。刘伟胜先生的著作《文化霸权概论》认为文化霸权就是“文化殖民主义”,“指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观的强加行为”,其实就是西方文化霸权,并详细考察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四种形态:意识形态的宣传、文化产品的倾销、话语霸权与信息霸权。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我们的应对之策。

以上三种理解颇有学术价值,对廓清其含义大有帮助。但存在两个缺点:一是三者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让人困惑不解;二是其理解都有自己时代的印记,随着国内现实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何准确地理解文化霸权,其真正含义是什么,便成为当时课题研究的主要任务,这就需要将概念的理解摆脱过去本土化的误读,专注于其真实含义及发展脉络。首先,便将萨义德的著作重新阅读,查看其提到的文化霸权论所受到的影响,加上此前国内研究资料的分析,便确定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文化霸权论的源头。其次,萨义德还受到了福柯的深刻影响,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被列为文化霸权论的第二个变异阶段。最后,萨义德的理论还有个强劲的对手,即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两者的观点相反相成,因此便将亨廷顿的理论列为文化霸权论变异史的固化阶段。

为了彻底地理解文化霸权这个关键词,试图获取其真正的含义,笔者广泛阅读了波寇克(Robert Bocock)、拉克劳(Ernesto Laclau)、墨菲(Chantal Mouffe)、本内特(Tony Bennett)、德里克(Arif Dirlik)、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米勒(James Miller)、博埃默(Elleke Boehmer)、贝斯特(Steven Best)、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斯道雷(John Storey)、费斯克(John Fiske)、霍尔(Stuart Hall)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著作,这些理论家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文化霸权论在国外研究界处于显学地位,涉及多种语言的资料,卷帙浩繁。对这些研究资料和理论观点,本书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六经注我”式的做法,主要汲取其有用的观点,对其相左的、相互之间矛盾的观点未进行辩驳,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完成这一任务。

随着研究的深入,寻找文化霸权的真正含义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难以完成,因为每个理论家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按照波寇克的观点,他们会因其问题的设定而有不同的看法,这一方面使人因最初任务的破灭而有着心情的沮丧,但另一方面却因不同观点的精彩纷呈而带来知识的愉悦。为了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本书试着从变异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一方面希望还文化霸权论的本来面目,于是将葛兰西、福柯、萨义德和亨廷顿四位理论家的文化霸权观作主要线索来探讨,力求将其观点公正客观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企图在其线索中发现文化霸权论的变异关系,对此,本书小心翼翼地借鉴了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学说,指望在理论的思路、结构和因素等方面的变异研究上能有所突破。总之,本书的研究只是一种“范式还原论”的研究,希望能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 方法论的说明

本书将具体的变异研究放置在最后两章上,第四章侧重理论变异的研究,第五章侧重实践变异的研究。在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列为文化霸权论变异的四个阶段后,又发现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联系,特别是

本书侧重研究的两个阶段，葛兰西的起始阶段和萨义德的完成阶段更是深受其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搅和在一起，而后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回顾本书的研究历程，既恼怒于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岔路，又舍不得放弃它，想做一番奇异的探险之旅，以至各章节之间可能存在着并不严谨的逻辑联系，或许在所采用的方法论上能多少弥补这种过失。

变异学方法论源自比较文学研究界对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思考分析，本书将此方法论加以运用来剖析文化霸权论的发展史。变异学方法论对于某种理论或观念的旅行分析是有巨大帮助的，理论或观念也存在着传播和接受的问题。采用变异学方法论，具体原因如下：

(1) 异质性原则。变异学方法论首先关注“异”的研究，分析文化霸权的观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背景、理论家以及学科领域的传布，“异”应该成为最为重要的分析对象。但这种“异”并非简单的理论不同，这涉及社会时代、文化背景、学科领域以及理论家自身所接受的影响等，本书侧重于两方面的“异”研究，一方面是理论的变异；另一方面是学科领域的变异影响，就理论变异而言，也非简单的观点不同，里面涉及范式的不同。托马斯·库恩说道，在初次接触亚里士多德有关物理学的个别观点时，觉得他完全不懂物理学，这些观点存在严重错误，而这些错误对于现在的普通民众都能看出来，何以亚氏还会犯这种错误呢？库恩通读完亚氏的著作后才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观点完全是由其特有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而库恩之所以觉得有问题，那是因为他用现代物理学的普遍范式去观照古希腊的物理学。文化霸权论也是如此，必须理解其范式，而这些范式的转换才导致了文化霸权论的变异。文化霸权论就有着明显的范式转换，葛兰西将文化权力化后，福柯主张话语权力化，萨义德结合两者使东西方文化表述权力化，而亨廷顿则认为文化认同的权力化导致文明的冲突。因此，简要地说，即从文化实践论、话语实践论和表述实践论，最后到认同实践论的范式转换。

(2) 冲突性原则。理论家有其结构化的理论体系，其观点建基于上，只有理解其结构体系才能做出正确的阐释，而要发端出自己的理论体系，

又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范式，这就导致了理论家在继承与发展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理论内在的冲突是范式的冲突，而非表面上的某个观点冲突。只有意识到范式冲突时，才能真正去评断此前所接受的理论。如萨义德批评福柯的范式局限于话语实践，在权力的普泛化后走入死胡同，但在自己的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范式中获得了新生。亨廷顿与萨义德针锋相对，前者立足于西方白人立场，认同并高举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同时害怕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掺杂而变质，从而失去其应有的优势。而萨义德则坚持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与交流，拒斥亨廷顿对文明认同的局限性，主张文明的多元化，甚至像霍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家直接提出并赞扬文明的杂交性。对理论家而言，只有激起自己内心的冲突，方能更深入地理解对方，也才能实现范式的转换，展现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变异学方法论不仅不避开冲突，反而将其作为对象加以深入分析，以便呈现理论的内在性转变。

(3) 历史性原则。比较文学界的变异学研究侧重于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这就涉及其历史性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隐含的各种问题，包括问题针对性的设定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等，也就是说，历史性原则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变异史的论述；另一方面就是每个理论所面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本书在方法论上参考了萨义德“理论旅行”的观点，尽量做到历史性原则在两方面上的结合，当然作为文化霸权论的理论基础研究，本书更侧重于理论自身的变异史。

(4) 批评性原则。批评表示一种距离，是作为旁观者对某个对象的透视与剖析，而不能与分析对象混合起来，以便确保变异学方法论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客观与公正。这种批评的距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要将理论本身与社会现实区分开来，任何理论如果没有保持一种批评的距离，很容易成为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了社会现实中某些重要的部分，理论因其范式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体系不可能涵盖整个社会现实，因此对于任意一种理论，既要知晓其涵盖社会现实的部分，也要了解其偷偷溜走的重要现实，即对理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同时，理论与现实的裂缝恰恰是新理论的生命力所在。在萨义德对威廉斯、福

柯等人的批判中，就清醒地认识到其理论所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端，尽管他们的理论针对欧洲的社会现实，但仅局限于欧洲内部，而忽略了欧洲早已与东方世界相互联系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第二，要将理论本身与社会实践区分开来，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理论强调的是其独创性与说服力，至于社会实践的可行性等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本书将文化霸权论的理论变异和实践变异区分开来，意图就在此。也就是说，当文化霸权论被运用于社会实践或其他学科领域时，就会碰到不同的问题，让文化霸权论再次发生变异。

总之，变异学方法论有上述四项原则，本书试图将其运用于文化霸权论的变异研究中，这种方法对于比较文学界而言，尚还处于摸索阶段，作为变异学方法论的案例，本书希望对其科学定位和最终确立有所帮助，当然不尽人意之处肯定在所难免，只能寄望于读者的谅解与包容。

三 本书的内容

本书站在全球化的文化视野，坚持本土立场，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全球定位与发展，在跨语际间文化霸权观念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面对全球化浪潮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选择、建设与发展道路，具有宏观的理论价值与文化意义。并立足于文学文化的真理性知识立场，对文化霸权观念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文化霸权观念过于考虑宰制与被宰制的权力问题，导致激进主义立场，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一概视为文化霸权的争夺，尽管不乏合理之处，但忽略其中的真理性内容，将会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走向歧途甚至是谬误。

当然本书的重点将放在对文化霸权论在东西方世界的理论旅行所造成的理论变异与实践变异做全面深入的梳理分析，描绘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知识权力理论、萨义德东方主义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文化霸权论变异史四个阶段上的不同范式引导下的冲突与矛盾，还这些理论以本来面目，最后将考察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模式，进一步沟通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为国内文学与文化研究模式提供理论方法的参

照体系。

具体地说，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文化霸权的提出。文化霸权论是由意大利革命家和理论家葛兰西对当时欧洲与俄罗斯革命进行对比思考与分析后总结出来的，文化霸权理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思想，本章试图抓住其颇具特征性的社会语境描述，其中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葛兰西转向，从唯物主义转向历史主义，从经济基础转向文化权力，从客观的物质科学性转向主观的精神意志性，以及阶级论转向历史集团论，等等，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国内学者对文化霸权论三种符号化的误解。

第二章：“变异学”方法论。“变异学”是当今比较文学界新近提出的理论方法，本章探讨了变异学在比较文学界提出的背景及其所针对的问题，指出变异学作为方法论必须坚持的四项原则，并希望这种方法论及其原则能运用到本书的研究中去。

第三章：文化霸权论变异的“四个阶段”。运用国内比较文学界最新提出的“变异学”方法论，从文化权力化、话语权力化、东西方文化表述的权力化与文明认同的权力化等四种范式的角度，在总体概貌上描述文化霸权观念在东西方世界的理论旅行，提出其在西方世界变异的四个阶段：起始阶段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升华阶段与福柯知识权力观、完成阶段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固化阶段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第四章：文化霸权论的理论变异。本章较为详细地叙述文化霸权论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福柯的权力知识论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在理论观点上的变异情况。因笔者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工作，该章重点放在葛兰西与萨义德的理论，葛兰西对文学与文化有系统的看法，而萨义德则是公认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其具体章节设置如下：

前两节探讨葛兰西与萨义德两位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变异关系，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批判与建构，实际上就是文化权力化

的文化霸权论建构，而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直接批评是后殖民理论对西方表述东方世界的科学知识的批判性清理，以此质疑西方世界所提出的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观念。对于萨义德的批评，新马克思主义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交锋，而后马克思主义者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又做出了变异性的回应，呈现两个阶段上的文化霸权论，既脱胎于马克思主义又与之发生多种变异的情况。

第三节主要讨论葛兰西与萨义德在文化霸权论的变异情况，比较两者的理论观点就会发现，萨义德受到葛兰西的影响，但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他在不少著作中盛赞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巨大意义。这种距离建基在理论体系的地理范式的差别上，葛兰西考虑的是欧洲的革命事务，而萨义德则分析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葛兰西理论中的文化权力的生产性与再生产性让萨义德着迷，但萨义德亦保持其特有的文化权力上的对位性，因此两者体现出三点文化霸权论的变异：弱势方争夺文化霸权与强势方维持文化霸权、区域内的文化霸权与区域间的文化霸权、具体社会实践的文化霸权与文化表述和话语运作的文化霸权。

第四节为剩余部分，着重探讨了作为文化霸权论完成阶段的东方主义与其他阶段的文化霸权论的变异关系，剖析了萨义德对福柯话语权力上的接受及其存在的问题，萨义德与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的较量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权力问题，以上所论均重在分析文化霸权论的变异状况。

第五章：文化霸权论的实践变异。本章侧重文化霸权在两个领域的实践变异：学科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在学科领域，详细分析文化霸权观念在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小说创作与文化研究等学科领域中的实践变异状况。最后将文化霸权的实践变异落脚到国内的社会实践上，希望在理论和知识创新上赋予更多的关注，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而如果只局限于立场的较量和文化权力之争，则会在远离真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书自立项起，就得到本书组成员及广大参与者的大力支持，他们

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得本书按照预期计划而顺利完成，最终以研究专著的形式出现，但本书的完成也只是学术研究过程暂时的标志而已，将来还需继续下去，进一步完善文化霸权论的研究，当然本书研究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皆因自己水平有限所致，亦恳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化霸权的提出	(1)
第二章 “变异学”方法论	(14)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危机与变异学的提出	(14)
第二节 变异学的特征及其问题	(22)
第三节 文化霸权、理论旅行与变异学	(30)
第三章 文化霸权论变异的“四个阶段”	(40)
第一节 起始阶段: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41)
第二节 升华阶段:福柯的知识权力观	(51)
第三节 完成阶段: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60)
第四节 固化阶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72)
第四章 文化霸权论的理论变异	(83)
第一节 文化霸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变异关系	(83)
第二节 东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变异关系	(106)
第三节 文化霸权理论与东方主义的变异关系	(137)
第四节 东方主义与知识权力观、文明冲突论的变异关系	(174)
第五章 文化霸权论的实践变异	(202)
第一节 文化霸权与文化批评	(202)

第二节	文化霸权与文化书写	(224)
第三节	文化霸权与文化研究	(235)
第四节	“文化霸权”话语的本土实践与反思	(241)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0)

第一章 文化霸权的提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霸权”（又译“文化领导权”）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讨论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全球文化状况的关键词。流风所及，20 世纪 90 年代，后殖民理论登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霸权问题也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焦点，这股讨论热潮余波未平，其影响持续至今。然而，检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相关论述，我们发现除了将“文化霸权”名称的首次使用权授予葛兰西，而且更多地还是从萨义德的《东方学》中得知这一点外，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论述较少，没有系统性，也没有具体的分析思考，更不用说追溯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的社会背景与理论来源，造成学界对其理论的一些误解。实际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有其前奏曲。当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状提供了其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欧洲革命的失败与“十月革命”的胜利直接成为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的契机，马克思、列宁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关系的分析与论述构成其理论来源。总之，文化霸权理论的产生既有无产阶级现实斗争需要的原因，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逻辑发展，还包含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

据考证，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首次出现在《关于南方问题的笔记》这篇文章中，写作时间是 1926 年。他写道：“都灵的共产主义者十分具体地给自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那正是无产阶级专政

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① 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是在对南方问题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意大利，北方工业发达，南方是落后的农业区，南方农民普遍认为他们的贫穷是北方人造成的。南北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南方农民与北方工人的隔阂和对立。葛兰西对南方问题特别重视，他认为南方社会由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大地主以及大知识分子三个阶层组成。思想文化领域由大知识分子牢牢控制，其代表人物就是时任意大利内阁成员、文艺思想界的泰斗贝奈德托·克罗齐。显然这些情况对无产阶级革命非常不利。有鉴于此，葛兰西认为要改变局势，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应该首先建立一个向工农进行教育的“党校”，并创办一份面向农民的刊物，宣传统一战线和阶级革命的思想，以取代大知识分子对农民思想文化上的控制。^② 其实，早在1917年12月葛兰西就倡议建立“道德生活俱乐部”；1919年，他又与陶里亚蒂、塔斯卡和特拉西尼等人一起创办了《新秩序》周刊，形成被后人称为的“新秩序集团”，其意图就在于引导工人阅读文化知识，宣扬革命思想，形成革命意识，开展各种形式的民主活动，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葛兰西提出夺取文化领导权不仅有其国内背景，也是他从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经过自己的一番思考的结果。20世纪初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标志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光辉榜样，也激励着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建立一个新型的、真正为自己服务的国家制度而奋斗。然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如芬兰、匈牙利、德国、法国、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国相继发生的工人运动却以失败而告终，统治阶级借机进一步加强了它的专制力量，疯狂地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起义以及罢课、罢教和罢商等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欧洲工人运动由此转入低潮，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严酷的社会现实催逼着葛兰西等无产阶级理论家与领导者转换革命思想，迅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措施，使无产阶级革命走

① 王昭锋：《如何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2期。

② 毛韵泽：《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09页。